



教育与两汉社会的 整合研究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ducation and
Han society

郝建平 著

中華書局

国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N HOUQI ZID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教育与两汉社会的 整合研究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education and
Han society

郝建平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郝建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4.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101-10190-4

I. 教… II. 郝… III. 教育-关系-社会发展-研究-中国-汉代 IV. ①G529.34②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2004 号



书 名 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

著 者 郝建平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郭 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9 $\frac{3}{4}$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190-4

定 价 86.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	1
二、学术史的回顾	2
三、基本思路、研究构架及创新之处	15

上编 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章 学校教育	21
第一节 官方教育	21
一、中央政府办教育	21
二、地方政府办教育	31
第二节 民间教育	36
一、程度较高的私学	36
二、蒙学	43
第二章 家庭教育	53
第一节 家庭教育的形式	53
一、世代家传的家学	54
二、家训	57
三、皇族教育	73
第二节 家庭教育的特点	77
一、崇尚经学风气的形成	77
二、书面训诫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78
三、家庭女子教育理论开始出现	80
四、胎教理论开始形成	91
第三节 家庭教育的作用	95

第三章 社会教育	103
第一节 社会教育的概念界定及历史回顾	103
第二节 社会教育的内容	107
第三节 社会教育的途径和形式	120
一、设官任职,以行政手段推行教化	120
二、通过奖德励善活动来扩大教化的影响	126
三、提倡孝道,奖励名节	128
四、以图画、碑刻形式进行封建忠孝节义等道德伦理观念的教育	140
五、通过提倡尊老养老以强化孝的观念	144
六、统治者的示范教育	159
七、发布诏书,宣传教化	167
八、皇帝巡行或派遣使者巡行天下,察民情,览风谣,举贤俊,宣明德化	169
第四章 汉代的教育观	177
第一节 关于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	177
一、教育对大多数人起作用的“性三品”说	177
二、教育对所有人都起作用的“性善恶混”论	185
第二节 关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187
一、教法辅思想的初步形成	187
二、教法辅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1
三、要因时而变化的教法关系论	193
第三节 关于君主教育	196
第四节 关于教学思想	200
一、关于教学作用	200
二、关于教学内容	204
三、关于教学过程	208
四、关于教学方法	210

下编 教育与汉代社会的整合

第五章 教育与政治的互动	221
第一节 政治对教育的影响	222

一、统治思想变迁对教育的影响	223
二、官学管理制度的确立	238
三、以经学为教育主要内容局面的确立	254
四、选士制度的逐步完善	269
五、尊师风尚的形成	278
第二节 教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284
一、“大一统”、“尊君”等统治思想的广为传播实有赖于教育	284
二、以经义断事は汉代教育对社会反馈功能的又一表现	293
三、博士议政,是知识分子介入封建政治的一种形式	310
四、太学生的政治活动体现了教育对政治所具有的调节作用	313
五、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是教育发展的结果	319
第六章 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327
第一节 经济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328
一、经济发展的水平影响着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328
二、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方式, 决定着教育培养人才的规格	340
三、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制约着教育内容的更新	341
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教学 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的变革	346
第二节 从经济政策的转变看教育对经济的影响	351
一、重农政策	351
二、限田政策	367
三、商业政策	376
第七章 教育与文化的互动	387
第一节 文化对教育的作用	387
一、文化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动力	388
二、文化对教育目标的制约	398
三、文化对教育内容的制约	400
四、文化对教育方法的影响	405
第二节 教育的文化传递、传播功能	407
一、文化的传递要靠教育	407

二、教育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420
结 语	433
附 表	441
主要参考文献	447
后 记	469

绪 论

一、选题的意义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两汉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时,虽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但却是第一个强盛的时期。在汉代四百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相当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重要表征。汉初奉行黄老政治,由于这一学说本身具有兼容的特点,因而在文化教育上,采取的是开放性政策。武帝时定儒学于一尊,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对社会的各个方面起着支配作用,教育亦不例外,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及教育思想理论,均受到儒学的影响和支配。武帝后,教育逐步走向儒学化,然而不论是武帝时期还是以后的历朝政府,均未有禁止、灭绝诸子百家学说的举动,只不过是把它们立于学官而已。实际上武帝后专门研习传授诸子杂学者有之,由儒家兼习、传授者亦有之,因此汉代教育在武帝后所形成的格局是:儒家教育处于主导、支配地位,而诸子杂学教育则处于从属的地位。那种认为武帝后汉代教育是单一儒家教育的观点,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在汉代,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府,均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用于兴办与发展教育,故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系统。与此同时,朝廷亦积极鼓励、支持民间的教育活动,使汉代的私学得以繁荣。私学不仅有力地补充了官学教育之不足,而且亦扩大了文化教育的影响面。鉴于各类学校所能容纳人数有限这一客观现实,为了把封建的伦理纲常灌输给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汉代统治阶级便利用了社会教育这一普遍的形式,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行发展,互为补充,形成了全社会的教育网,从而有效地加强了思想控制,巩固了封建统治。家庭教育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儿童早期教育、女子教育及许多学术、技艺,都有赖于家庭教育。

汉代教育之所以能获得高度的发展,与统治者认识到教育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分不开。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使汉代政府能够

采取一系列重学重教的政策、措施,从而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在汉代重学重教的诸措施中,对教育影响最大的是选士制度。国家通过选士制度对官学、私学的办学宗旨、教育内容实施有效的控制,从而保证了学校能够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和要求来造就人才。这种选士制度原则上向一切学有所成者敞开仕进之门,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只要学业精进,便可步入仕途。这样就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各类学校的高度兴盛。但至东汉中期后,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选士之权日益为势家大族所垄断,变成他们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的工具,其所体现的“尚贤使能”的精神遂渐趋丧失,选士制度对教育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就日渐式微。

总之,汉代无论是在教育理论上,还是在教育实践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初步建立起较完备的教育制度和体系,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教育的基础。研究两汉时期的教育,总结其成败之经验教训,批判地吸收其合理因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提供资料,作为借鉴,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作为社会文明传递和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社会其他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因而我们要全面、正确地认识两汉社会,就必须对教育与社会的其他子系统,如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互动关系,作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二、学术史的回顾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汉代教育研究概述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而生生不息,即使在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亦能保持其本质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的文明都相继消亡,但中国文明却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良,得以维持下来。中国文明也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早先的佛教影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直到现代的西方科学的影响。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没有把他们变成欧洲人。”^①

最早较为集中记载汉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活动的是《史记·儒林列传》,随后《汉书》、《后汉书》仿《史记》体例,亦设《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则罗列了当时的图书文献目录。宋代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依据正史材料,把有关汉代选举、官学(太学、郡国学、宫邸学、鸿都门学)、图书的资料分类编排在一起,查阅起来十分方便。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选举考》、《学校考》,有关于汉代选士及学校沿革的叙述与考证,是研究汉代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然而,在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政治的附从,未能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研究领域。中国教育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初。

1916年,郭秉文撰写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②出版。该书以极其简明的语言概述了从远古至民国初年间教育制度的发展沿革。其中仅有寥寥数百言谈及汉代教育。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类出版物达六十部之多。涉及汉代教育的有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③、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④、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⑤、周予同的《中国学校制度》^⑥等。

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以洋洋数十万言叙述了从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主要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该书是一部内容较为详实,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教育通史著作,构建了后世编写教育史的基本框架。书中关涉汉代教育的内容有:两汉学风、两汉教育制度及其实施、两汉教育家及其学说。对私学几乎没有顾及,是其缺陷。

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是一部较有特色的教育史著作。该书叙述了西汉至清末各代的学校制度、选士制度及学风、士风的演变情况,并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所涉及。书中用较大的篇幅对汉代的官学、私学、选举制度

① 《罗素文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②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③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④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⑤ 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⑥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师范小丛书》,1931年版。

及学风、士风作了分析与介绍,引用的材料较为丰富,不足之处是对教育思想关注太少。

在《中国学校制度》中,周予同以五、六万字简要概述了从远古至1930年学校制度沿革的历史。书中简要介绍了两汉学校的系统与种类、太学的创立与演变、太学的博士与太学生、郡国学校的起源与发展、两汉的特殊学校、学校与选举的情况。

除以上著作外,关于汉代教育尚有八篇论文发表:陈东原的《汉初之教育》^①、《汉代之私学教育》^②、《汉代之官学》^③、《中国正式教育如何自汉代产生考》^④,萧鸣籁的《东汉时的勤工俭学》^⑤,蒋白幻的《两汉太学生之学习生活》^⑥,王永详的《东汉讲师考》^⑦和周光倬的《两汉太学生考》^⑧。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相继爆发,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几乎陷于停滞状态,面世的成果极其有限。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汉代教育的论文仅有两篇:钱穆的《两汉博士家法考》^⑨、朱子方的《汉代私学之盛衰及其学风》^⑩。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代教育研究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由于诸种原因,中国教育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有影响的著述并不多见。其中有关汉代教育的只有两部著作。一部是沈灌群的《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⑪,论述了自远古到清前期学校教育和教育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其中对汉代的官学、私学作了介绍,并对董仲舒、王充的政治、哲学思想及教育理论与教育方法,进行了评价。

另一部是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

① 陈东原:《汉初之教育》,《学风》1935年第5卷第1期。

② 陈东原:《汉代之私学教育》,《学风》1935年第5卷第2期。

③ 陈东原:《汉代之官学》,《学风》1934年第4卷第9期。

④ 陈东原:《中国正式教育如何自汉代产生考》,《学风》1932年第2卷第6期。

⑤ 萧鸣籁:《东汉时的勤工俭学》,《文史学研究所》,1935年第3卷第3期。

⑥ 蒋白幻:《两汉太学生之学习生活》,《史学》1933年第2期。

⑦ 王永详:《东汉讲师考》,《东北丛刊》1930年第1期。

⑧ 周光倬:《两汉太学生考》,《史地学报》1924年第2卷第1—2期。

⑨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文史哲季刊》,1944年第2卷第1期。

⑩ 朱子方:《汉代私学之盛衰及其学风》,《东方杂志》1947年第43卷第9期。

⑪ 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料》^①。书中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太学、郡县学、私学、取士制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以原始材料为主,适当收入后代学者有价值的成果,如《日知录》、《观堂集林》、《经学历史》等,是一部十分有用的工具书。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逐步达到了高潮,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通史著作有王炳照等编的《简明中国教育史》^②,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③,李桂林主编的《中国教育史》^④,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⑤,喻本钱主编的《中国教育发展史》^⑥。这些著作都对汉代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选士制度及董仲舒、王充、郑玄等的教育思想,作了或浅或深的叙述。其中《中国教育通史》的研究较为深入,对《白虎通德论》、《说苑》、《新序》、《潜夫论》、《申鉴》、《中论》、《太平经》等文献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挖掘。

断代史有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的《中国古代教育史》^⑦,杨荣春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⑧。对汉代“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官学私学的发展概况、察举制度及董仲舒、王充等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

专题史则种类颇多:

关于高等教育史研究,有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⑨、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⑩。对汉代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高等教育发展的概况、教师的选拔任用与学生的来源、教学与行政管理,王充、董仲舒等高等教育家的生平事迹及主要教育观点,作了较为详明的介绍。

关于教育思想史研究,有郭齐家的《中国教育思想史》^⑪,王炳照、阎国

① 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② 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⑤ 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喻本钱主编:《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⑦ 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⑧ 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⑨ 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⑩ 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⑪ 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华主编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①。前一部书仅对董仲舒、王充的教育思想进行介绍。后一部书内容则较为丰富,除对有代表性教育家董仲舒、王充、郑玄的思想进行论述外,还对司马迁、刘向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王符、荀悦、徐幹的教育思想,以及《盐铁论》、《白虎通义》中的教育思想作了勾勒。这是一部有关汉代教育思想的力作。

关于教育家专题研究,有宋本成等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及教育思想评价》^②、毛礼锐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传》^③、《中国教育家评传》^④。这些著作,除了介绍董仲舒、王充、郑玄的生平事迹和教育活动外,还对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历史地位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关于教育管理史研究,有熊贤君的《中国教育管理史》^⑤、梅汝莉主编的《中国教育管理史》^⑥。这些著作,对汉代的教育宏观管理政策、教育管理制度、选士制度以及教育管理思想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

关于教育比较史研究,有陶愚川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⑦。该书从教育政策、教育行政制度、学校制度及教学内容、人才选拔制度、教育思想发展等方面,对两汉教育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关于女子教育史研究,有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⑧。该书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汉代女子教育的特点:第一,有一部分书香世家女子受到较高的教育;第二,汉代贵族妇女很重视化妆术;第三,随着民间道教的兴起,道教在部分女子中传播开来,女子教育中便增加了道教内容;第四,汉代女子文学艺术教育较前尤为发达。该书概要介绍了贾谊、刘向、班昭、邓绥、蔡邕的女子教育思想。熊贤君的《中国女子教育史》^⑨,则从女子家庭教育的实施、女子道教教育、两部女子教育经典和蔡文姬个案等方面,对汉代的女子教育作了简明的论述。

① 王炳照、阎国华主编:《中国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宋本成等:《中国古代教育家及教育思想评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③ 毛礼锐主编:《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⑤ 熊贤君:《中国教育管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 梅汝莉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海潮出版社,1995年版。

⑦ 陶愚川:《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⑧ 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⑨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关于儒家教育史研究,有俞启定的《先秦两汉儒家教育》^①。该书论述了先秦两汉时期儒家教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独尊儒术政策在教育领域的主要表现,选士制度及中国古代儒学教育的特点。

关于考试制度史研究,有盛奇秀的《中国古代考试制度》^②、黄新宪的《中国考试发展史略》^③、郭齐家的《中国古代考试制度》^④、刘海峰的《中国考试发展史》^⑤。这些著作对汉代考试的兴起、汉代察举考试、汉代太学的课试作了介绍。

关于家庭教育史的研究,有马镛的《中国家庭教育史》^⑥。该书从帝王家教、士大夫家教、商人家教,家庭教育艺术,胎教理论,女教理论等方面对汉代的家庭教育作了概述。阎爱民的《中国古代的家教》^⑦和毕诚的《中国古代家庭教育》^⑧对汉代的家庭教育亦有简要之介绍。徐少锦、陈延斌的《中国家训史》对汉代的一些典型家训作品作了分析^⑨。

关于教育史料,有孟宪承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⑩。该书选录了董仲舒的《对贤良策》、《深察名号》,《史记》中的《论六家要旨》、《儒林列传》,扬雄的《学行》,王充的《实知》、《超奇篇》、《问孔》。程舜英的《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⑪。本书是一部资料书,又是主要以历史资料为依据扼要叙述两汉教育制度发展史的读本。其特点是分专题,专题之下按编年比较系统地陈述教育制度和实施的历史发展,用资料来说明史实。另有熊承瀚的《秦汉教育论著选》^⑫。编入本书的汉代教育论著有以下一些方面: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关于教育和选举制度的方针政策,关于学校制度的建立,关于选举制度的建立,关于养士和用人的论述,关于教育内容与方法问题,关

① 俞启定:《先秦两汉儒家教育》,齐鲁书社,1987年版。

② 盛奇秀:《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③ 黄新宪:《中国考试发展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④ 郭齐家:《中国古代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⑤ 刘海峰:《中国考试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⑥ 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⑦ 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

⑧ 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⑨ 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⑩ 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⑪ 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⑫ 熊承瀚:《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于经今古文之争和谶纬与反谶纬之争,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关于教师和师生关系,关于礼乐教育以及礼与法、教与刑的关系等。

80年代以来,关于汉代教育研究的论文约有一百余篇,内容涉及文教政策、学校教育制度、教育思想、选举制度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1)关于文教政策

“文教政策是国家政府制定、颁布和施行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方针或策略,它体现了一定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基本内容,规定了办学的总的指导思想,也影响着学校教育的体制、发展规模和侧重点,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纲领性的意义。”^①因而它就成为研究教育史者首先需要面对并加以说明的问题。

学术界一般把汉代的文教政策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对这一提法目前尚存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如林甘泉指出,汉武帝确实实行过“独尊儒术”,即在思想领域内压抑各家,实行儒家专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请求,以及汉元帝后,儒家学说成了封建国家的正统思想的历史事实就是明证^②。管怀伦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策、思想和社会转型需要的重大举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③。张烈在论述“独尊儒术”是历史必然的同时,对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独尊儒术不仅在当时对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后来历史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儒家的一统思想在历史上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一直起着积极作用。儒家的仁义思想逐渐形成具有民族

① 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② 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论战国至西汉前期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③ 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特色的伦理道德观念^①。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汉武帝并未实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如孙景坛指出,汉武帝根本没有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证据有三:第一《史记》未记董仲舒对策;第二《汉书》虽书,但自相矛盾;第三《资治通鉴》载之不实。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纯属子虚乌有,学术谎言^②。庄春波也认为汉武帝尊儒并未罢百家,而是“兼容并包”,“霸王道杂之”,以醇儒传经,能者为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司马光伪造的史事,动机在于影射神宗更化易政,反对王安石变法^③。

大多数人则持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并未罢黜百家的观点。如李文东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既不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绝其道”,“邪辟之说灭息”,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禁绝百家,而是罢黜前朝所置的诸子博士官,以后唯设儒家五经博士官,不再设诸子博士,确立了儒家的官学地位。汉武帝实行的是在确立儒学统治思想条件下的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而非封建文化专制政策。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发展,对西汉盛世的出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④。马雪芹也指出,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只是说不为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设博士官,并非要禁止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流传。在诸子百家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尚未恢复之时,武帝首倡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将诸子百家的有关学说与著述抢救过来,使之充于秘府。至成帝、哀帝,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使刘向的《七略》问世,使诸子百家学说得以保存并流传于世。就这点来说,武帝不但没有罢黜百家学说,扼杀百家文化,反而对诸子百家持保护态度。正因为如此,诸子百家文化才未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再次遭受灭顶之灾,而是经过一段复苏之后又有所恢复^⑤。

(2)关于太学

太学是汉代官学中的主体,历来为学者所重视。刘良群从太学的建

① 张烈:《“独尊儒术”是历史的必然》,《文史知识》1985年第9期。

② 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③ 庄春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辩》,《孔子研究》2000年第4期。

④ 李文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文化政策》,《许昌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⑤ 马雪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新解》,《人文杂志》1999年第5期。